



葵育之回忆

『阎王殿』旧事

葵育之 著

江西出版集团
江西人民出版社



龚育之回忆： “阎王殿”旧事

龚育之 著

江西出版集团
江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龚育之回忆：“阎王殿”旧事 / 龚育之著.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12

ISBN 978-7-210-03731-6

I. 龚… II. 龚… III. 龚育之 (1929 ~ 2007) —回忆录
IV.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79803 号



出品策划：

网 址：<http://www.xinhua bookstore.com>

书 名 龚育之回忆：“阎王殿”旧事
作 者 龚育之
责任编辑 游道勤
特约编辑 张克俭
美术编辑 兰 馨
装帧设计 蒋宏工作室
出版发行 江西出版集团
江西人民出版社（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330006）
经 销 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北京九章图文设计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7
字 数 397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0-03731-6
定 价 45.00 元

总 序

——为“中国人物系列”和“中国往事系列”而作

李 辉

我们生活在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生活如以往一样，每天都在流动。但是，流向何处，如何流动，谁能说得清？面对现实的丰富多彩和变幻莫测，我们的困惑，或许更多于兴奋。

君不见，启动电脑，走进电子网络世界，铺天盖地的信息汹涌而来。电子网络如此快捷如此便利，一个人名，一个地名，一个事件名称，键盘轻松一敲，几秒钟时间，它便跟随搜索引擎走遍了世界各地百万千万上亿网页，把搜寻结果呈现在你的面前。

这的确是一个奇异的世界，历史上发生过的一切，扑朔迷离的事件、光怪陆离的景象以及众多大小的人物的命运，似乎都被一网打尽，再也不会被忽略，无论是谁都可以神游其中，与历史亲密接触。

然而，这只是一种可能。我们每日看到的还有另外一种景象：娱乐化挟电子网络之便利而蔓延。历史被戏说，被删减，甚至如同电脑文件一样被格式化。令人遗憾的是，历史健忘几乎在每个年龄层次的人群中都普遍存在。不同历史阶段众多事件的来龙去脉，今昔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若隐若现，人物性格与命运的丰富多彩，诸如此类与民族记忆密切相关的内容，很难说不会被慢慢消解而散失——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

现实情况不正是这样吗？人们习惯于臧否时事，慷慨激昂而大发宏论，或者在网络世界以片言只语挥洒激情。但有的人没有意识到，自己所立足的历史叙述，很可能不是坚硬的石头，而是一堆由片面、偏颇、甚至偏见构成的沙丘。有的人往往自以为洞悉一切，其实所知甚少。历史的许多细节，彼此之间盘根错节的关系，早已变得陌生。某些今日发生的国内或国际事件，

初看起来清晰明了，我们哪里知道，许多事情其实背后早就有复杂的历史原因纠缠其中，远不像非此即彼如此简单。问题是，我们很可能对此无从知晓。或者，纵然有心，也无能为力了。

幸或不幸，我们就处在这样的一个特殊情境之中：一方面，电子网络的空间迅疾拓展，历史与现实的容量可以放大到难以想象和预测的无限；另一方面，历史的叙述则又逐步萎缩，许多曾经重要的人物的名字逐渐被淡忘。

作为一个写作者和历史爱好者，我常常感到困惑。欣喜还是悲观，哪里说得清楚？

不管如何，写作者和出版者，还是应该积极应对电子网络的挑战，于坚韧沉着之中，将历史记忆尽可能地清晰地呈现出来。它们是故事，是细节，同时也是知识，是思想。星星点点，方方面面，不同时期不同人亲历的一切，不同领域不同性格的人物，一旦汇集起来，将为人们了解历史提供丰富的文本。

走进电子网络虚拟世界，我们脚下踩着的，却应是一块坚硬的基石，而不是一片轻飘的浮萍。

这就是此次我应新华立品之邀策划出版“中国人物”和“中国往事”两套丛书的初衷。

“中国人物”与“中国往事”，相对独立，各有侧重。但实际上互有交叉，很难有绝对清晰的区别。事中人，人之事，又如何能分开？

“中国人物”主要选编某一作者关于不同人物的印象记，同时，兼及人物传记。不同的选本和传记一旦汇聚一起，就将形成中国各界人物的群体形象，从而有可能呈现出千姿百态的人物画廊，使读者对历史的触摸，因人物性格和命运的强烈反差而变得生动起来。

“中国往事”则以事为主，由事入史。主要采取集中描写同一主题的方式，或个人一生扫描，或某一事件描述，突出亲历者的回忆，其叙述也尽量立足于历史文献的记录。

两套丛书体裁有别，但贯串其中的文化品位和精神追求应是一致的。这就是：尊重历史，强调客观，注重细节，突出多样性。

是为序。

二〇〇七年七月十九日，北京

自序

从《几番风雨忆周扬》、《〈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开始，近十年中，我陆续写了一些关于故人故事的回忆文章。其间曾经结集出版，是李辉主编的《沧桑文丛》中的一种，书名为《在漩涡的边缘》。

这书名有点费解。原来想表达的意思是，从《二月提纲》到《汇报提纲》……这一个个政治风暴、政治漩涡，我都被卷了进去，沉了船，没了顶。在当时，那灾难使人恐惧，使人绝望。事后回忆起来，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能有历史的机遇，亲历了这些事件，近距离地观察、体验了这些事件，这不也是一种难得的缘分吗？当然，我不在这风暴、这漩涡的中心。在这中心的，是彭真、陆定一，周扬、许立群这些人物。我只是在漩涡的边缘。离漩涡的中心，还有一大段距离。但是，中心和边缘，又是相对的。相对于彭真、陆定一，周扬、许立群，我是处在边缘；相对于卷入风暴的挨批挨斗的数以百万千万计的广大干部来说，我亲历了、近距离地观察了那么多重大事件，又应该说我是处在漩涡的中心，而远非漩涡的边缘。

所以，当我应李辉的要求，扩充我那本《在漩涡的边缘》的时候，除了新增后来写的《胡绳琐忆》、《我所知道的陆定一》等文章以外，书名也作了修改，改为“‘阎王殿’旧事”。

这个书名，也需要解释。

“阎王殿”，这是特定时期的特定用语，是贬称，是恶谥，指的是陆定一、周扬主持下的中宣部，又叫旧中宣部。旧中宣部、旧文化部、旧北京市委，这是最先被砸烂的“三旧”。“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中国往事
杂忆之回忆
阎王殿
旧事

这条最高指示一公布，旧中宣部就被砸烂了。旧中宣部的部长和副部长们、大部分的处长和副处长们、什么长都不是只是干事干得多一些的几名干事，都被打倒在地并且扫进了牛棚。

砸烂了旧中宣部，建立的当然是新中宣部。但这新中宣部在混乱中挣扎了大约半年光景，就随着陶铸的倒台而倒台，新任命的副部长们也同旧中宣部的副部长们一起被扫进了牛棚。

自此以后，中宣部这个机构就不再存在了。所有干部，被一锅端，相继到旧北京市委党校去办学习班、到宁夏贺兰县去办五七干校。任务是：斗、批、散。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阎王殿”这个恶谥也在清理之列，党中央为中宣部恢复了名誉。这一页历史已经翻了过去。但是，我这本书的书名，还是用了“阎王殿”这个译名，一是因为这是一段历史，一是因为别的名称会引起别的麻烦。比如说，可以叫“旧中宣部”，这是正名，而不是译名。但是，区别于“旧中宣部”的“新中宣部”，又是指的什么呢？是指陶铸的那个半年光景的“新中宣部”，还是指“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重新建立的“新中宣部”？我们是应该强调新建立的中宣部同过去的中宣部之间的新旧对立和断裂，还是应该强调它们之间的历史联系和传承？所以，还不如沿用“阎王殿”这个称呼比较恰当。它当年是个恶谥，现在则成了对一段历史称谓的并无恶意的调侃。

为中宣部“阎王殿”平反，这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已经做了，但是，对陆定一、周扬主持下的中宣部的工作做历史评价，则是一个复杂得多的问题。在我这本书里，没有为这段历史做总体评价的意图。这一方面是因为我缺乏这个能力和意愿，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作为一名干事，在中宣部工作涉及的范围有限。我只不过是写了我的一些亲历亲见亲闻，力求不溢美也不饰非，提供一点史料，留给后人评说而已。

我一九五二年从学习岗位调到中南海中宣部工作，到一九六六年中宣部“阎王殿”被摧毁，长达十四年的时间。这是我参加工作的最初的十四年，是我青春美好的多采的十四年。在这十四年里，我结识了一些师友，他们都是一时的风云人物、难得的豪俊之士。他们有长处，也有弱点，有贡献，

也有失误。在回忆里写下他们留在我心中的身影，我认为自己的责任。所写故事，大都是发生在“阎王殿”里的故事，但是我同这些人以后大多还有接触，有些同志，比如胡绳，在新岗位上仍旧是我的领导。所以，对这些故人旧事的回忆，自然而然延伸到我同他们在那以后的接触和交往。

《在漩涡的边缘》出版时，我写了这样几句话：

“研究当代的历史，是一件很有兴味的事情，因为我们都从这历史中走过来。我们曾经竭尽绵薄参与推动这历史，又曾身不由己被这历史所推动。这使我们在研究中产生特殊的亲切感，又产生特殊的沉重感，但并不因此而使我们更容易看清、看懂这历史。”

我在《党史札记》的《书前小引》中重述了这段话，现在在这篇自序里，再一次重述这段话。

龚育之

二〇〇六年八月七日于北京医院

目 录

自序 / 001

几番风雨忆周扬 / 001

《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从〈二月提纲〉到〈汇报提纲〉》

之一 / 039

《科学十四条》和广州会议——《从〈二月提纲〉到〈汇报

提纲〉》之二 / 065

《汇报提纲》的前前后后——《从〈二月提纲〉到〈汇报提纲〉》

之三 / 096

中宣部里看傅鹰 / 114

胡绳琐忆 / 142

胡绳晚年论胡适 / 173

彭真、许立群与北大社教——我的所见所闻 / 185

“故人长忆亦长磋”——悼党史学家郑惠老友 / 202

我的第二个上级——怀念秦川同志 / 212

听毛泽东谈哲学 / 218

《周扬集外集》序 / 239

两件事忆沙洪 / 245

《如火如荼话周扬》序 / 250

我所知道的陆定一 / 257

我的第三个上级——于光远素描 / 308

关于四个历史材料的说明 / 320

编后记 / 412

几番风雨忆周扬

这是我第二次提起笔来写纪念周扬的文章了。

第一次是在一九八九年九月，周扬同志逝世（七月三十一日）不久，遗体告别仪式（九月五日）刚举行过的日子里。这仪式的规格应该说是极高的，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彭真等同志送了花圈，党的总书记江泽民，国家主席杨尚昆，国务院总理李鹏，还有许多领导人，亲往告别。我到北京医院参加送灵，在八宝山灵堂看到里面和外面来向周扬作最后告别的拥挤的人群。来的人远比发出通知的数目要多。消息报道报的还是五百余人，这是通知的数，因为实际数目据说是没法统计……

然而，那个时期的报纸上却似乎没有见到一篇悼念的文字。当然不会是没有人想悼念他。大概是各种人由于各种原因，当时都感到难以下笔吧。我的一些朋友劝我写一点，我也想写一点。从哪里下笔呢？

我写下了这样一个题目：《所希望于〈周扬文集〉的》，并写下了这样几行：

周扬同志与世长辞了。他的同志、朋友、学生们纪念他，我以为最重要的一件事，是编好《周扬文集》，让后人通过他自己的文字了解他的一生，了解他所参与的我们党在文化和思想战线上几十年战斗的历程。

周扬同志是一位著作家。当然，他首先是革命家和战士，而著作正是他从事革命和战斗的主要方式。

这篇开了头的文章，没有能够写下去。也是有难以下笔之处。这难处，下面再说。现在，第二次提笔（严格地说，我已经“换笔”，改为“敲键”，不好叫“提笔”了），从哪里写起呢？想来想去，还是从头写起，原原本本地写吧。就是说，从我知道周扬，见到周扬，后来在他领导下工作、同他有所接触写起，写我有限的所见所闻，所知所感，其中是非功过，不溢美也不饰非，提供一点零星史料，留给后人研究评说。

一、闻名

我知道周扬的名字，还是在解放以前，从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那封关于“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论战的公开信中。

那时我在湖南长沙念高中，算是进步青年吧，鲁迅的话，我们是很崇信的。从这里得到的周扬形象，自然不是一个好的形象。不过，我也从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中，知道周扬后来到了陕甘宁边区，在那里做了教育厅长和《文艺战线》的主编，是那边文艺界的代表人物。对

于解放区人物，我们都是抱有敬意的。对周扬当然也是如此。什么口号之争，在我们的感觉中早已成为过去很久的历史。鲁迅那封信在严厉地批评了周扬之后，不是说过：周扬“也许别有他的优点”，“也许后来不复如此，仍将成为一个真的革命者”吗？李何林对周扬的介绍，就注在他引用的鲁迅那句话的后面。那时怎么也不会想到，这场历史争论还会一再以极其严重的尖锐的形式重新卷回到文艺界、思想界乃至我们国家政治



一九四九年七月，周扬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作《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

生活的现实中来。

解放区的文艺，在国统区的进步青年中有很大影响。但我们注意的是作品，像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和《李家庄的变迁》呀，古元和彦涵的木刻呀，它们给我们展现出全新的生活和世界。我们大多数人那时还不大注意文艺的理论和领导，所以对周扬，可以说，没有什么印象。北平解放以后，清华大学请过不少名人来演讲，文艺方面的，有丁玲、光未然、周扬、杜矢甲……我那时在清华念化学，但是这些文艺家的演讲，我都去听的。首次见到周扬，就是从清华大礼堂座位上远看周扬在讲台上。丁玲谈青年恋爱问题，讲根据地里知识分子出身的县长同农民出身的妇教会主任在工作和战斗中恋爱和结合的故事，杜矢甲用很土的、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因而觉得挺怪的嗓音唱民歌，我至今还能记得。而周扬讲了些什么，我印象全无了。只记得他口才很好，滔滔不绝，很能吸引听众。略带益阳口音，这是我这个湖南人能听得出来的。时常有拖长的“啊——”作为停顿，频频回头望一望主持会议的人，问一声“是不是啊”，这种演讲风度，同我们过去熟悉的学者们的演讲不同，属于后来我们逐渐熟悉的领导干部作报告的风度。

二、部下

一九五二年我调到党中央宣传部科学卫生处工作。周扬任中宣部副部长，我应该算是他的部下了。但是，他主要是在文化部当副部长和党组书记，并不常来中宣部，来，我们这些年轻干部也没有接触他的机会。只能还是从他的文章和报告中“接触”他。不过，这时的我，对于他的文章和报告是很注意的了，因为它们代表着党的领导在文艺问题上的声音，是我需要知道也很想知道的。特别是从他的文章、报告和他在一些小的工作性质的会议上的讲话中，常常可以听到一些毛泽东主席的意见。

比如，他一九五三年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其中解决了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中国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问题。

那时，刚刚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一种看法是，我们以前都

是讲新民主主义（在文艺上通常是提“革命的现实主义”，也有过“新民主主义的现实主义”的提法），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以后，才把社会主义作为党和人民的现实任务，所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中国应当从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算起。另一种看法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已经明确规定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所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中国也应当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算起。（现在回过头来看，这类看法表现了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观点的强烈影响。不过，现实主义既然冠以“社会主义”，也就很难不从政治上何时提出现实的社会主义任务来考虑问题。）还有一种看法，则是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算起。这种看法比较地从文艺或者说从文艺的指导思想和创作方法看问题了。周扬这个报告，则是从五四新文艺运动和鲁迅算起。

《周扬文集》第二卷收录了这篇报告，其中是这样说的：“毛泽东同志早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曾指出工人阶级的作家应当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创作方法。从‘五四’开始的新文艺运动就是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的，这个运动的光辉旗手鲁迅就是伟大的革命的现实主义者，在他后来的创造活动中更成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伟大先驱者和代表者。”

记得曾经听周扬说起，这是按照毛泽东主席的意见写的。我觉得，同



那些狭隘的观点相区别，这里体现了一种宽广的政治胸怀和切实的历史考察。对历史，就是应该有这样的胸怀，做这样的考察！苏联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是在三十年代，但是他们讲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无产阶级现实主义文学）的历史，是从高尔基的《母亲》讲起，而不只是

五十年代周扬（中）陪同周恩来来看画展。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周扬在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作总结报告。



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讲起的。（周扬这里引用的毛泽东《讲话》，已经是解放以后有所修订的版本，在延安发表的原来的文本中，他引用的那句话，原作“无产阶级现实主义”，那时也避开了“社会主义”的字样，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表达同样的意思。这是我后来有机会仔细研究《讲话》版本源流的时候才发现的。）

又比如，一九五四年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学术思想，批判胡风文艺思想，我们当时自然是从周扬《我们必须战斗》这些文章中寻求指导的。

《红楼梦》我是读过的、喜爱的，俞平伯、胡适关于《红楼梦》的研究著作，说实在话，像我这样算是爱好文艺的青年，过去也没有读过。倒是这场批判，引起我们津津有味地来读这些书。中宣部的青年们也开会学习和批判，记得有一位同志发言，批俞平伯关于“寿怡红群芳开夜宴”座次的考证之繁琐和无益。许立群那时是中宣部理论教育处的负责人，从青年团中央来的，参加了我们青年的会，却频频摇头。大家问他的看法，他说：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描写生活是非常细致和准确的，一次宴会，谁坐在什么位置，作者心中有安排，不会信笔乱写，后人能从书中的描写推算出作者心中安排的座次，可以说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成功。许立群的异议和高见，给我们很深的印象和启发，让我们知道看问题不能那么幼稚和简单。应该说，这些考证和研究中的确有一些有益的东西，不能一概否定的。（我就感到，宝玉病后，喝鸡汤，太烫了，是“众人来吹”，还是“袭人来吹”？俞平伯力辩通行版本中“众人来吹”之误，讲得是有充分道理的。可惜至今还没有看到哪个版本按这个考证把这个错字改正过来。）从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读到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我们一些青年觉得两本书是一样货色，

中国往事
革命之回忆
胡风

后者的考证甚至比前者更繁琐，也应该批评。

这时，听到周扬和胡绳（胡当时任我们科学处处长，卫生和体育已经另外成立一个处了）讲，对周汝昌不要批评，要把他放在这场思想斗争的“友”的位置上，要让他一起来参加对胡适的批判。这对我们是一种政策和策略的教育，我们都觉得从这里学到了一种政治智慧，克服了“单纯学术观点”的书生之见。从他们那里知道，这也是毛泽东主席的意见。当然，现在来看，那些政策和策略的考虑，除了起保护一些人的积极作用的一面之外，是不是也有把关于《红楼梦》研究的学术问题过分地政治化了的一面？如果就把《红楼梦》研究上的各种意见都当作学术问题来讨论，是不是要好一些呢？

胡适批判中知识界一个普遍的思想问题，就是认为不能抹杀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也是听周扬和胡绳讲，毛泽东主席说了，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当然是有贡献的，这个现在不必多讲，将来是要讲的。这也是一种政治智慧。现在来看，是不是也有对学术问题过分政治化了的一面呢？

胡风批判，对我们的震动很大，因为他和胡适不同，解放以前我们就知道胡风是左翼。同知道周扬的名字一样，我也是从鲁迅答徐懋庸那封公开信里知道胡风的名字的。虽然后来也约略知道在重庆和香港的时候，党的一些理论家对胡风有过批评，但那是属于左翼内部的争论呀，怎么现在搞得这么严重，而且径直称为“反党”并迅即升级为“反革命”了呢？

“胡风分子”绿原的事，更使我震动，因为他就任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工作，跟我们在一个机关。我早就知道他是一位诗人。不久以前还读过他的一首《我沿着中南海的红墙走》，充满着对党的感情。读的当时，我就想，我也是每天沿着中南海的红墙走呀（中宣部当时在中南海办公），人家写出了诗，我就写不出诗来。胡风材料一公布，令人大吃一惊，原来他竟是中美合作所这个特务机关里出来，混进了中南海红墙的暗藏反革命！（我是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才听说，绿原根本没有到中美合作所去，正是胡风告诉他那个地方去不得。这一事实真相，在审查绿原一开始时就弄清楚了，却一直没有让公众知道。这在政治道德上，是多么值得记取的

沉痛教训啊！)

不过，这里应当说明，作为我忆周扬的文字，这些话是岔开了，因为在胡风批判的事情上，周扬做过和说过什么，我全无接触。

三、科学处

记不准是不是一九五五年，胡绳不管科学处了，原来的副处长于光远做了处长，周扬作为副部长，分管科学处的工作。在中南海庆云堂的一间会议室里，周扬来参加我们处的会，宣布他的施政方针。他说：他分管文艺处和科学处，按重要性来说，他认为搞建设了，科学比文艺重要。但是，他还是会用更多的时间管文艺，这与他个人的经历和背景有关，大家一定会理解的，并不是他认为科学次要。

他还表示很欣赏科学处的组成方式：几位老一些的同志，带一批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别的处老同志多，来几个大学生，有的还是在接电话，当“行政干事”，搞抄抄写写，发挥作用不充分。科学处，因为要有科学知识，形成了现在这样的以年轻人占绝对大多数的结构。这有好处，可以充分发挥年轻人的作用，而据他的观察和他听到的舆论，科学处的这些年轻人工作得还不错嘛。

他还很赞成科学处的干部都钻一门专业，做一些研究，写一些文章，力求成长为一个方面的专家。那时，孟庆哲、李佩珊都是有中学学位的人了，何祚麻、罗劲柏和我，在通常情况下一周有两天到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去学习和研究专业，我们大家在处里经常在于光远带领下做关于自然辩证法和科学技术在社会中发展规律的研究。

周扬肯定科学处组成方式和工作方式，我们当然都很听得进。

四、《大辩论》

在这以后几年里，我记不起周扬关于科学方面的工作管过和说过一些什么，大概的确是管得不多。他主要管文艺工作，而文艺工作，我们只是旁边和远处的观众，依然是通过读他的文章来“接触”。

这个期间，文艺界一会儿批评丁玲、陈企霞，一会儿实行百花齐放、